

评武道房《曾国藩学术传论》

蒋广学

摘要: 曾国藩是晚清同治中兴的首功之臣。如何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认识曾国藩理学之产生、主要内容和特色以及它的历史作用,学术界未能获得统一的见解。武道房的《曾国藩学术传论》正是围绕着这三个基本问题,阐明了个人的观点。武书认为:面对官场严重腐败而引发的激烈的社会矛盾,清汉学改其支离琐碎之弊、宋学弃其空谈之风,双双转向经世致用;湘籍官员和学者乘此风之先而为曾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曾国藩将陶冶人生、治世与学术探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以理学为核心,吸纳汉学,在用字上采集西学的体系,礼理相通,治心与致用结合。武书还对曾学与晚清桐城派的关系作出探讨,指出:曾吸桐城之文,增经世之实,使其理学独具风采。曾学具有守旧与开新二重性。本文在评析武书内容的同时,亦阐明了个人对理学及曾学的看法。

关键词: 清汉学;调和汉宋;理学即礼学;经世之学;天道循环

中图分类号: B25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3)02-0059-05

嘉庆后期至咸丰、同治之世,乾嘉考据学渐趋式微,今文经学开始勃兴。此时,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都经历了向经世致用方向的转身和演变。这一转向虽然在深层次上都还保留着各自的学术精神,但其面貌已变得丰富多彩,有的甚至无法识别了。林则徐被誉为晚清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他青少年时期就读的鳌峰书院,一直奉行“非理之书不得妄读”的传统;而他本人在为官之后,便将格物致知之学运用于治国方略。魏源“师夷以制夷”的思想即来源于程朱理学的信奉者林则徐。魏源被晚清今文经学家奉为开宗之先锋,他向汉学与宋学同时开弓:他一方面批琐碎的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出于无用之途”,另一方面质问宋学家“释老不可治天下矣,心性迂腐谈可治天下乎?”他所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和《海国图志》,已经模糊了汉宋中西之界限。但有意思的是,魏源二十多岁时曾有“问宋儒之学于姚敬塘先生”的经历,而且早年

对于宋学濡染颇深。其后的咸丰、同治年间,西技西学愈入愈深,汉学、宋学之关系则更加复杂。因而,梳理这段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分析这一时期再据主导地位的“理学”的新特点,是一个有意义的学术课题。以往学界对此研究不多,或不够深入。而新近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武道房《曾国藩学术传论》,便是以曾国藩为典型个案,试图解析道、咸、同学术演变的著作。

本书是武道房在其博士论文《曾国藩理学思想研究》基础上,历经8年的深入研究而写定的。在此书出版之前,部分内容拆成7篇文章,约有15万字即已发表于《中国哲学史》、《学术月刊》、《文学遗产》等国内知名杂志上。曾国藩是学术史上的热点人物,要想出新,原也不易;但武道房此书能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没有新见,不肯下笔,这种科研态度是可取的。

作者在《自序》中说“本书只重在解决四个问题:1. 曾国藩的学术是什么,与前人相比有没

收稿日期: 2012-10-25

作者简介: 蒋广学(1940-),男,江苏徐州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常务副主编,南京 210093。

有什么新意;2.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学术;3.他的学术与前人有哪些联系以及对后世有哪些影响;4.他的学术与其人生的关系如何。”曾国藩是镇压席卷了大半个中国、长达数十年的太平军起义之后再造清室“中兴”的首功之臣,他的学术造成了全国性的影响和巨大的历史场面,而后再迅速地被翻涌而来的西学所席卷,被声势浩大的维新改良和政治革命所淹没。因而,跟随着曾国藩学术演进的思路,层层剖析他学术思想的内容,显示那一时代的学术面貌和特征,便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论题。就此来说,武道房博士的《曾国藩学术传论》是一部认识道、咸、同学术史的重要著作。

2001年,武生道房从学于我在南京大学读博士。而我那段时间常思考的问题是:清代宋学在被乾嘉汉学批得遍体鳞伤之后,为何在咸、同之际又获得了一定的活力?而刚刚获得一息生机的理学立刻又受到西方民主、宪政思潮的批判,但借着今文经学而向传统政体发难的康有为,恰恰是由理学家朱次琦(世称九江先生)的弟子;而跟着康有为鼓吹政治改良的梁启超和谭嗣同,其受教育的背景无一不是宋儒之学。这些现象意味着什么?为何在中西学十分对立的背景下,理学还以特殊的形式葆其生命?怎样把这些零零散散的问题集中起来做一个系列的研究,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恰在那时,《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曾国藩评传》要另寻作者,我暗自思量,如果最后找不到合适的作者,可以从我的博士生中培养一位,作为“试探”,就与道房商量可否将曾国藩的学术思想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他经考虑后表示同意,博士论文的题目就确定了。但不久,远在长沙的王兴国教授向我推荐了梁绍辉教授来撰写《曾国藩评传》,经茅家琦先生同意,书就由梁教授来写,而武生就让他专心做曾国藩理学思想研究吧。回想这段小小的插曲意在说明,以道房当时之学业和精力,写一部包含曾氏生平业绩且以政治思想史为主要内容的“评传”,可能

一时难以深入下去;而专门进行曾氏理学思想之研究,可以暂时撇开政治史、战争史乃至经济史之资料直捣他的灵魂居所。现在看来,在这座经曾氏亲手翻修的巍峨学术大厦中,道房整整研究了十年,而且创获不少。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他对清代中叶学术发展的转向、对曾国藩的师友关系对其理学学术观的形成、对曾国藩的理学体系及其特色,以及对被曾国藩再造了的理学对晚清社会的影响等重要问题,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如果说曾氏学术可以喻为一座古朴广厦的话,武生这幅油画,则是一幅非常逼真地描绘曾氏精神大院的作了。

“学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不可能远离政治发展的轨道自行其事,但它的发展也有其自身的脉络。为了认识曾国藩学术思想的形成及其主要特色,道房通过宏观与微观两条路径进行了考察。宏观就是清代中叶的学术转向。经过清高宗的推动,以《四库全书》的编纂为主要标志,考据学进入了它的巅峰期,然因其学风破碎,特别是因为大批文人靠咀嚼俚语为生计,故而在国内外矛盾日益尖锐的嘉庆中后期就迅速地衰落下来。这是搞清学史的人普遍明了的。然而,经过道房的观察,当时衰落的只是其俚语之学,而其中的笃实精神转变为关注社会矛盾的经世致用之学。其标志是:今文经学的复兴;汉学本身产生了义理化的倾向;汉学家放弃了对宋学极端排斥的态度。阮元明确提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武生评之曰“总之,汉学家也认识到死搞学问于世道人心无益了。他们或发挥汉代经学的义理,或适度肯定宋学,调和汉宋,开始有了经世意识和联系治道的自觉性。”正是在此种学风潜转的风气下,理学的势力得到了“回潮”。最为突出的标志是方东树《汉学商兑》的多次再版等。当然,“回潮”并不意味着没有新时代的思想内容。恰恰相反,许多理学家表达了对人欲横流、漠视民瘼、不讲气节等

官场风气的不满和对道德问题的关切;认为“吏治之坏,根于士风;士风之衰,起于不知教化”。武生对此评价说“理学在清中叶的复兴,实非偶然,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出于救世补天的需要而兴起的一股学术思潮。”并指出“理学的复兴产生了一批严守三纲五常、理欲之辨的‘气节’之士,如曾国藩、罗泽南、刘蓉、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当然他们的理学已不同于传统,而是广收杂学,成为理学经世派。”(第63~64页)道房还认为,除了时代因素促使理学复兴的原因之外,曾国藩的理学也有其家学、乡学传统。上述这些结论应该说都是深入而又准确的。

曾国藩多次指出学术应分为四途“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也,经济也,考证也,辞章也,是即三不朽之所从入也。”这说明曾国藩学术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而从他所排的顺序看,他是把理学之义理放在核心地位的。曾氏尊程朱,不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而是将其视为“为己之学”,即作为人生信条而真诚践履。这是真道学还是假道学的分水岭,也是曾国藩能成就事功、再造乾坤的精神动力所在。武生深察此义,立“人生境界”一章加以阐明。曾氏好友刘蓉曾致信曾国藩“功利之习,溺人最深,时会所趋,靡然向之,苟非豪杰,未有能自拔于风波颓靡之中者。此病不除,虽欲入道而不可得,则义利理欲之辨,为己为人之分,抑又学者所宜自力者矣。”曾国藩对程朱所谓天理人欲之辨深信不疑,他的修身之要是“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一是自讼好钱、好色之心,二是自讼不良嗜好和生活习惯,三是自讼好名邀誉之心。而处事之要则是“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是俭以养廉,二是生死、成败、毁誉不足以撓其心,三是明公私、义利之辨。(以上见第四章)表面看来,这似乎都是做官之私德,然不能内圣者,何以外王?作者很明确地指出“理学是心性的学问,偏于内圣和修身。曾国藩通过理学的修养,养成了坚强的意志,勤俭的作风,血诚的性格,以及生死利害不动

于心的殉道精神。世人正是通过这些,看出曾国藩之所以成功,来源于他的学术。”如清末曾廉认为“其在道光时,唐鉴倡学京师,而倭仁、曾国藩、何桂珍之徒相从讲学,历有年数。罗泽南与其弟子王鑫、李续宜亦讲学穷庐,孜孜不倦。其后内之赞机务,外之握兵柄,遂以转移天下,至今称之。则不可谓非正学之效也。”(第262页)

其实,《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传统学案体著作,在评述某一理学家的学术大旨之时,总是先叙其生平事迹以及做人处事的风格。这种学术史惯例和笔法自有其深意在。因为理学家研究形上之道并不是目的,而是意图将他们的学术贯穿到人生日用上来。说到底,理学是一种人生哲学。但是,时下研究古代哲学的书,多是从理论到理论;而研究历史人物的书,又多是从事迹到事迹。对曾国藩这样的集哲人、政治家、军事家为一身的人物,如果单就某一方面研究,就不免给人以“隔”的感觉。道房此书,一个较突出的特点是,不仅详析曾国藩的理学范畴、体系及其意义,而且结合其人生境界分析曾国藩的做人处事之道。用传统哲学的术语来说,不仅叙其“迹”(生平事迹),而且分析其“所以迹”(事迹背后的精神世界)。这样的写法,吸取了传统学案体著作的优点,也能够加深人们对曾国藩学术的全面认识。

那么,怎样全面评价曾国藩学术内容呢?其实,无论是义理、考据、事功、文章,都是儒学传统的一支。曾国藩能使这些分支相互包容,浑然一体,以追求所谓“内圣外王”的事业,这是他学术气象阔大的一面。不仅如此,道房通过对曾氏学术的全面考察,提出了“曾国藩从道光二十一年(1841)与唐鉴交往之后,其学术观点已经确定,其后虽有所调整变化,但大体不变,概括来说即是‘以理学为核心、以汉学为补充,以辞章为手段,以经世为旨归’,或者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即是融‘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为一体的内圣外王之学”。(第145页)这里,我突出介绍一下道房

此书对曾国藩“会通汉宋之礼学思想”的看法。武生认为,会通汉宋礼学是当时学术发展的潮流使然。清初的理学是主礼的;而从汉学的发展来看,尊奉戴震的扬州学派的凌廷堪在批判宋学的过程中,形成了“以礼代理”的思想,提出“夫舍礼而言道,则空无所附;舍礼而复性,则茫无所从。盖礼者,身心之矩规,即性道之所寄焉矣。”而比较理学之礼与凌氏之礼,虽有前者强调“心性立而礼义成”和后者认为“礼义成方知理义立”区别(类似于孟子与荀子的致思差异),但两种思维方式,均强调了理与礼的统一,从而形成了“通经、修德与致用”正、反、合再次循环的新过程。曾国藩正是理礼之争的终结者和新思路发展的推动者。当然,“他仍然认为理是礼之体,礼是理之用。这似乎又回到了清初,但是又有不同,曾氏礼学思想格局分外阔阔,已不仅仅局限于三礼学,大凡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等等,无不在其礼学的视野之内,这与先秦时期的礼意内涵更为接近了。所以说,自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宗旨后,中经‘以礼代理’的演变,到了曾国藩又会通前人,变成了‘理学即礼学’。他的礼学即是曾氏特色的理学。曾国藩的礼学当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清代礼学史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中国学术发展内在逻辑的继续展开和延伸。”(第188~190页)道房能从清代理学史、礼学史的宏阔背景中具体分析曾国藩调和汉宋的学术史价值,对曾氏“理学即礼学”的思想穷源溯流,并剖析其用意所在,结论都颇有见地。

曾国藩的文学思想引起了道房的特别注意。他专立一章考辨了曾国藩与桐城派的关系。在汉学的鼎盛时期,义理之学被排挤至讲求词章的桐城派手中,曾国藩宗仰宋儒多是通过研读方苞、姚鼐诸公的文章而确立的;这一点研究者多已注意。曾国藩改造桐城派文论,提出湘乡派的文学主张,这一点也为学界所熟知。问题是:曾国藩改造桐城派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其深层的原因是什么?曾国藩重构桐城派

文论与汉宋学术之争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学界的讨论是不够的。道房通过研究认为:清中叶的汉宋之争是曾国藩古文理论形成的一个深刻背景。乾嘉以降,桐城派古文广受汉学家批评。汉学家责难程朱理学为孔门异端,推崇骈文为古文正统,嘲讽桐城文人空疏不学。这些批评无异于对桐城“义法”进行全面否定。汉学派挟其显学之势使嘉道时期的桐城派陷入困境。曾国藩古文从桐城派入手,但他在继承桐城堂庑的基础上,又广泛吸取汉学家的批评意见,从而对桐城文论进行了一番较大创新和改造。具体做法是:对姚鼐“义理”、“考据”、“辞章”三要素进行内容修正,同时添加“经济”之学。在义理上,曾氏坚守宋学信仰,同时吸纳汉学,调和汉宋;在考据上,曾氏重视研究历史兴衰治乱之源、制度因革之要,归旨于经世;在辞章上,推崇骈散兼行,追求雄直之气。曾国藩的古文理论兼采并扬弃汉宋,是汉宋学派由长期的对立冲突走向调和兼容的必然结果;它不仅使咸、同时期的桐城派得以复兴,同时促成了湘乡文派的崛起,在晚清文学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意义。此前学界对曾国藩的文学理论,多知其然,但对其所以然的解释尚嫌不足。道房能结合当时学坛、文坛的深刻背景给出一个圆通的解释,思路是可取的。这一部分内容已发表于《文学遗产》,已足以说明其学术价值。

如所周知,理学家如倭仁之流在晚清多是文化保守派,现代学者多说他们是顽固派。他们信奉程朱,讲道德人心,反对搞洋务,反对学西方。为什么同为理学家的曾国藩却成了手辟洋务运动的第一人呢?道房的观点是,这是曾国藩理学创新的结果。曾氏以理学为核心,吸纳汉学,从而调和汉宋,使他容易接受新事物。钱穆先生曾说过“汉学派的精神在通经致用,宋学派的精神在明体达用,两派学者均注重在‘用’字。”汉学家如戴震等人从经学上的实证方法转手,转而研究有关天文、地理、算学等实学。这个看法很有见

地。事实上,团结在曾国藩周围的一批科学家如徐寿、华衡芳、徐建寅等人,都是来自汉学家阵营。曾国藩的礼学是调和汉宋的结果,其意在使汉学家的“观象授时”、“体国经野”等经世实学为理学的体——“三纲五常”服务,这就使他的思想颇为宏通,容易接受西学实用的一面,也使他与理学顽固派区别了开来。洋务运动的兴起,与曾国藩以理学为体、广纳汉学、讲求经世的学术思想支撑是分不开的。这个解释让人有豁然开朗之感。

本书最后思考了曾国藩学术的历史命运问题。曾国藩镇压了农民军的起义,让清朝又苟延残喘了近半个世纪,政治上如何评价他,如作者所言,并非此书的任务。武生在最后一章中,给曾国藩学术的定位是:其一,曾国藩学术思想促成了晚清理学的复兴运动;其二,曾国藩学术思想终结了清代汉宋学派长期对立的局面,促使汉宋调和成为晚清学界的共识;其三,曾国藩的礼学思想为洋务运动和西学的传播提供了理论的支持。这三个结论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分析基础之上的,真切可信。对于曾氏学术的评价,在政治观念上远远超越了洋务派而走上维新道路的梁启超的说法,受到作者的注意。梁氏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第285~286页)道房还梳理了自晚清以来对曾国藩学术评价的历

史,认为随着环境的变迁和时代思潮的变化,对曾氏的品评无不打上时代的印记。不同的时代对曾国藩都作出了不同的解读。如何在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重新认识曾国藩的价值,仍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道房大作勒成后,曾希望我给本书写一序,对其书稿的内容、学术价值给予批评。但我担心《曾国藩全集》未能遍读,以及文中所涉资料有不少也未曾经眼,以是不敢应允。今作为读者谈一些体会,如能对其他读者起点导读作用,我就心安了。这里想说明两点。其一,理学,不只是曾国藩再造过的理学,就其本义而言,它是为人们特别是做官的人或有社会地位的人设定一个合理的而不是纵欲的生活方式,它试图通过熏习而养成仁义礼智信的内在本性,从而培养高尚的君子品格。就此来说,它不会因时而废,也具有永恒的价值。今天,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大学教授等高级人才,难道不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而不是纵欲的生活方式,来养成为民服务的品德吗?但理学之“理”,乃是宗法的、等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伦理关系的反映,所以只有扬弃了这些内容,理学才会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持久地传承下去。其二,就本书的内容而言,在讲到曾氏的人生境界时,《易》学对他的影响揭示不够。事实上,“上九”招怨,以及“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的天道循环之论,对他有极深、极强的影响。虽然作者说到了“自讼”的各种品质,若能提到此“纲”上来,对曾氏心灵世界的窥探可能会更透彻一些。如果道房觉得我的这两点想法还有些道理的话,望能在本书再版时予以酌情吸收。

(编校:章敏)